

现代化模式

严立贤◎著

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

从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来看待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此实现了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现代化模式

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

从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来看待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
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 / 严立贤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108-0485-4

I. ①现… II. ①严… III. ①现代化—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6079号

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

作 者 严立贤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9.25
字 数 485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485-4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分为旧民主主义现代化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等三种模式，从这三种现代化模式的转换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书中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和分析了以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发生、发展及其交织和转换的过程，由此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趋势，阐明了近代中国最终走上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根由。本书最后部分还认真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1949年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过渡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具有明确的连续性的观点。本书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将生产力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相结合而形成现代化模式概念，提出从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此实现了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

导言

本书力图从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来看待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政治变革的历史，可以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将现代化划分为三种模式或三条可能的发展道路，即：一、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分为旧民主主义现代化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

所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地主资产阶级所推动的现代化，他们力图在不触动根本封建半封建制度的范围内，推行经济上的工业化和实行政治上的轻微改革，以期将近代工业生产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成为维护他们的封建半封建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这种模式的现代化肇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建立国家垄断资本和以国家政权或官僚特权为依托的官僚私人资本为目标。在本书中，我们把国家垄断资本和以国家政权或官僚特权为依托的官僚私人资本合称之为官僚垄断资本。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对应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

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是由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这种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又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其中资本比较雄厚，或社会地位比较高，社会影响比较大的部分，也即他们的上层部分，是他们的领导力量。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内容是：在政治上主张不推翻封建半封建政权的统治，而试图促使封建半封建统治阶级自身向资产阶级转化，以改良的形式确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民主制；在经济上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并期望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政权大力扶植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以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

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是作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立物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由孙中山开创、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对立。首先,在政治制度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要求维护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实行重君轻民的君主立宪制或虚假的共和制,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其次,在经济制度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以及以国家政权和官僚特权为依托的官僚私人资本,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以及为防止民间私人资本过度发展的国家资本。孙中山主张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但在目睹了西方私人资本过度发展而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后,又提出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方法限制私人资本在中国的过度发展,以防止在中国出现如西方国家那样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现象。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首先,在对待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对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进行改良,促使其自身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次,在对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样,主张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通过“平均地权”使土地国有化。第三,在对待民间私人资本的问题上,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基于“私有制度虽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的认识,主张民间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方式将私人资本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其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以避免因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矛盾,避免“贫富悬绝”的现象,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是一种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

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即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首先,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不再由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领导,而是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其次,现代化的阶级基础获得了扩展。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十分狭窄,只有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

民阶级，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阶级基础扩展到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第三，土地政策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使用，而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只是主张国家用赎买的方法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农民使用。第四，国家资本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在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要求国家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中，国家资本（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在量上不一定要占主导地位。第五，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明确宣布，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通过民生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缺陷，继承和发展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成分，使空想的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演变为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而国民党蒋介石却恰恰相反，抛弃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成分而承继了其中的缺陷，结果使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蒋介石利用孙中山没有找到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拒绝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将国家资本的范围定得过于宽泛的缺陷，大肆侵蚀一般私人资本，发展国家垄断资本。由于没有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村经济越来越凋敝。在农村缺乏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也难以得到发展。与此相反，国家垄断资本和四大家族官僚私人资本却在不断侵蚀和吞噬农民和民间私人资本的过程中，畸形地发展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实际上恰恰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背叛者。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现模式继承和发展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真谛，而蒋介石所推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近代中国，首先登场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二者是同时登场、相互交织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互交织和相互斗争，都试图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来。清政府试图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但缺乏资金和管理人才，不得不利用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意欲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但没有政府的支持，则是寸步难行。于是，它们在洋务运动中走到了一起，都想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其结果是民间私人资本被洋务官僚集团所侵吞，官督商办企业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互交织

和相互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取得了优势。戊戌变法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第二个回合的纠葛和斗争。在戊戌变法中，清政府中的帝党开明派试图在政治上向民族资产阶级作一些让步，在经济上推行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以换取民族资产阶级对清政府的支持，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想对清政府进行改造，使清政府转变为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在顽固派后党的干涉和破坏下，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这次纠葛和斗争以双方失败而告终。庚子之变以后，清政府终于决定向民间资本作出让步，也就是所谓的“厉行新政”。日俄战争后，清政府甚至决定在政治上推行“宪政”，开始所谓的“预备立宪”，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推动清政府实现自身的近代变革，也大力推进“立宪运动”，于是开始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第三个回合的纠葛和斗争。但是，清政府顽固的坚持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始终不肯向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实质性让步。清政府出台的“宪法大纲”所给予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力比《日本帝国宪法》还要小得多。随着皇族内阁的登场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民族资产阶级最终与清政府决裂了。民族资产阶级终于认识到清政府是一个无以改造的腐朽政府，加入到了由孙中山领导、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导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之中。

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从一开始就以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立面出现。辛亥革命是孙中山试图领导革命派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一次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却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他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的阶级基础，没有去发动农民阶级来支持他的现代化模式，而始终利用会党和新军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活动，革命缺乏强有力的阶级力量的支持；二、革命派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完整地把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只局限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当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各省纷纷独立之后，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把革命的目标局限于建立共和制，甚至出现了支持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现象。三、立宪派的作用。立宪派在立宪运动中曾试图对清政府进行改造，但在对清政府完全失望之后，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最后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与革命派联合，并不等于他们开始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立宪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仍然坚持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他们只不过是更替他们的代理人而已。立宪派选中了他们的新代理人，这个人

就是袁世凯。立宪派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是辛亥革命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四、帝国主义的破坏。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谁掌握政权更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清政府拒绝改革，已为万人所唾弃，显然已不能为帝国主义效劳；孙中山要推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显然不能为帝国主义所接受；因此，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心一意推行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袁世凯，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意中人。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孙中山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努力功败垂成。孙中山作为一个先觉者，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住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但由于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没有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历史作用，面对帝国主义的破坏，立宪派的反对，革命同志的背离和袁世凯的狡诈，他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地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孙中山精心设计并勇猛推进的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的计划，并没有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设想进展下去，而是半途而废了。在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的中国，在工农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孙中山显得是多么的势单力薄和孤立无援。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并不是北洋军阀集团单独执政的政府，而是由北洋军阀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原立宪派共同掌权，而北洋军阀集团居支配地位的政府。民初的政争实际上是三种政治力量为推行各自的现代化模式而进行的斗争。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要把中国引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原立宪派和旧官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以及后来的进步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力图依靠袁世凯推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孙中山则领导革命派继续进行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活动。在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派的共同牵制下，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但是，在成功地拉拢了原立宪派、打击了革命派之后，袁世凯就原形毕露，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官僚垄断资本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民族资产阶级被出卖了，他们不得不又和革命派联合，在护国运动中打倒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中无一人能统合各派政治势力，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但三种现代化模式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如北洋政府两度挑起宪法危机，孙中山因而两度发动护国战争，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力量而不得不运用军阀的力量，结果都失败了。这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斗争。再如北洋政府与中国银行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斗争。这一时期一直到1927年，由于北洋政府不能有效行使统治权，加上抵货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外国商品和资本的撤出，民族

资本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国家政权不能有效行使的时候，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对近代中国反动政权的极大讽刺。

袁世凯和张勋的先后复辟和封建文化的回潮，震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中国的现代化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挫折，中国的知识分子打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吹响了人的现代化的号角，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孤立运动，如果没有后来五四运动的发生，没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大概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发生，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虽然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并不是在走圆圈。首先，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地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逐步走向独立；其次，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起来，并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先进的知识分子把新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变化，这个根本性的历史变化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开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有形式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形式转化，这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原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即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既有继承性也有新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一、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置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由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群众，并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推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二、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使用，也就是用暴力的方法而不是用“购买”的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三、缩小了国家资本的范围。在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家资本起主导作用，即在量上要占优势，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营经济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成分，即在量上不一定占优势。四、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不同在于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手段和目标也发生了变化。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对立，完全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对立，其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但是，从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向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过渡并不是简单

的和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首先，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有了新的发展，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在与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交织、融合中逐渐形成的。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经历了许多次失败。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终于找到了阶级力量，从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孙中山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阶级力量，在辛亥革命前是利用会党和新军的力量，辛亥革命后则利用军阀的力量进行斗争，结果不得不经历一次次失败。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阶级力量，首先是学生，继而是工人阶级，最后是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认识到唤起农工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了新三民主义，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还没有形成，才刚刚进入探索阶段。从1921年到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支持和推动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同时，探索新的现代化模式，逐渐摸索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段。

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发展，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新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支持，使得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同时，推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北洋军阀政权深恶痛绝。这样，一场以阶级大联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部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为基础的大革命——北伐战争，就拉开了序幕。但是，这次联合注定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对，如工农阶级要进行土地革命，而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则反对土地革命。从根本上说，他们都要推行各自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他们只是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最低目标上取得一致。他们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在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又有威望统一全党的人物之后，在北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特别是在工人运动和农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初露端倪的时候，分裂终于开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或中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竭力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力主推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戴下，开始与工农阶级分道扬镳。但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领导人却不能正确认识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没有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而是试图通过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

级，通过压制工农革命以缓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结果使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新右派（或中派）取得了政权。1927年蒋介石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政府，但不久就开始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蜕化。由此，中国的现代化分裂成了两大模式，一是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利益，退居边缘农村，推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民族资产阶级则跟着大资产阶级跑了，他们以为蒋介石会代表他们的利益，幻想依靠蒋介石政权推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事实证明，他们的幻想不久就落空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基本精神在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推行过程中并不很顺利，主要问题在于党内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不统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推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才逐渐成为党内的共识。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和1940年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先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1927—1937年的十年间建立了官僚垄断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抗日战争开始后，又借统制经济建立了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在产业领域的垄断地位。蒋介石拒绝实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并利用强制发行公债，又通过苛捐杂税将公债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和民间资本身上的方法，将社会财富不断吸入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手中，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急剧膨胀、民间资本萎缩、农村经济凋敝的头重脚轻型经济结构。民族资产阶级原本想依靠蒋介石推进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结果却在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的侵蚀下，走上日益衰退的道路，除极少数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被蒋介石吸收、拉拢、结合进官僚垄断资本体系中去以外，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物都不得不走上反对蒋家王朝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曾脱离革命阵营，跟着大资产阶级跑了，但在1945年以后，又回到了革命阵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民族资产阶级在1945年以前，一直在追求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但却一直不能如愿。他们几次选择了自己的代理人，但他们的代理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抛弃他们，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不是他们选错了人，而是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近代中国，决定了要么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要么通过革命，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及后来的新民主

主义现代化)道路,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近代中国国情的必然结果。

头重脚轻型经济结构是完全违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规律的。因为只有农村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广泛发展,才能对工业品产生广泛而持久的消费需求,才能推动工业化强有力而持续的发展。蒋介石政权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行将农村和民间的财富吸收到国家手中,养育出庞大的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而农村经济则越来越凋敝,民间资本也越来越萎缩,其结果是社会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弱,为工业化的发展所需的国内市场越来越狭小,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走进了死胡同。此时,中国的工业化也许还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像20世纪初的日本那样,走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对外扩张道路。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决定了这只不过是梦人呓语而已。头重脚轻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标志着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它就要崩溃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高度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历史作用。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取代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近代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趋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斗争下,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彻底结束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命运,开始了推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时代。

本书最后一章还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过渡的历史过程。

在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起到了阻碍现代化的作用,如果不发生后来的革命,按照清末立宪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就会顺利地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观点主要为国内外一些自由学派学者所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主题是革命而不是现代化,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在近代中国虽然存在着缺乏现代化的问题,但却不存在现代化的过程,只有在取得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才有可能开始现代化过程;一种是认为在近代中国虽然也存在着现代化过程,但只是一个从属的过程,是一个从属于革命的过程。主张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上述两派观点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我们认为,上述两派观点都是错误的。在

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并不是互相割裂的两个不同的历史事物，现代化也不是从属于革命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革命则是从属于现代化的政治活动，是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是围绕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政治斗争，是现代化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内容，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纵观近代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过程，可以看出，每一场革命运动都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运动，都不仅仅是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固有内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在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固有内容和内在要求，是因为中国政府顽固地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恶果是国家政权利用特权将民间和社会的财富强行吸入国家和官僚私人之手，形成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而民间资本则日益萎缩，农村经济越来越凋敝，从而使工业化走入死胡同。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追求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追求社会的现代化，因而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国家政权的支持。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就在追求国家政权的支持。但是，事实证明，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就没有真心实意地支持过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总是在试图利用、渗透和吞并民间私人资本。清政府是这样，北洋政府是这样，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是这样。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近代中国是一种走不通的现代化模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一种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直接对立的现代化模式，它在内容、目标和阶级基础上都直接的相对立。在近代中国，只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更准确地说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彻底结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命运，使中国走上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民族资产阶级最终转而支持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说明在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取代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这种取代当中，革命作为一种暴力手段，起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固有内容，成为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受挫，而不得不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必然现象。在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比较顺利，特别是先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这些国家，革命不会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发生。在这些国家，只有当实现了高度现代化，也即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纳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此时的革命并不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不是现代化的固有内容，因为现代化在此时已经实现。此时的革命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

社会要迈入更高阶段，要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必然要求。而在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受挫而需要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革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革命具有了不同的含义，革命与现代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这种国家，在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现代化之后，特别是像中国这样通过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转而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将不再需要通过革命的手段通向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也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可以实现直接的过渡。通过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走向同样的理想社会，是社会发展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阶级分析引入现代化研究，使现代化理论成为一种科学的、具有更强解释力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并通过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理论。国内学术界以往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大都单纯地采用生产力分析法，或把现代化研究等同于资产阶级研究。虽然这种现代化研究也对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却始终只能作为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成为一种主体框架。本书将阶级分析引入现代化研究，创立了阶级分析和生产力分析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概念，大大扩展了现代化概念的内涵，使现代化成为一个包括革命在内的、能够涵盖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架构。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教授在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文中谈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能取得。”本书将阶级分析法引入现代化研究，就是力图从一个途径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并竭力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初步创新的一个努力。

最后，本书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交织、矛盾和转化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揭示出近代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并进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为了解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根源、本质内容及基本趋势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序论：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转换看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1
第二章 洋务运动中官僚垄断资本与民族资本的交织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滥觞	21
第三章 甲午战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斗争与辛亥革命的发生	64
第四章 1912年至1927年间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式微	85
第五章 1912年以后孙中山为推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所作的努力及由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向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过渡	104
第六章 1927—1937年上半年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陷入危机	124
第七章 1934—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政权乘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建立官僚垄断金融资本的活动	152
第八章 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垄断工业资本的活动	175
第九章 抗战时期的统制经济及国民党政府借统制经济侵蚀、侵吞民营资本的历史事实	201

第十章	抗战时期民营资本的发展、衰落和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统治地位的确立·····	238
第十一章	1946 — 1947 年间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工业的膨胀和民营资本工业的危机·····	284
第十二章	1948 — 1949 年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工业的破产和民族资本工业的没落·····	349
第十三章	附论：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388
参考文献	·····	431